

为古史延续命脉

——《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活动入选书目》之史部书籍评议

辛 德勇

整理出版古籍，在现代很多与古代典籍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看来，似乎是一件很边缘的事情，不仅与社会一般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在文化生活领域，也只是很少一小部分专家者流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古代，却是另一番景象。

众所周知，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度，而唐玄宗时期发明这一技术之后，五代后唐诸朝在社会上第一次大规模印刷书籍，就是印制在此之前已经流传很久的经书，在当时是地地道道的古籍，而不是当时人的著述。至北宋初年全面推广雕版印刷，像《史记》、《汉书》等最基本的古代史书，亦即所谓“正史”，也很快被雕版印行。这一做法，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承，迄至明清，朝廷司掌刻书的主要机构国子监或所谓武英殿，依然把刊刻列朝正史作为其主要工作。透过这一史实，我们就不难看出，刊印前朝旧史，本来是中国古代出版业中的一项核心工作。

这些前朝旧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产生文字错讹，轻则文气不畅，严重时就会影响读者对史书本义的理解，有时甚至会产生很大误解。因此，从雕版印刷产生之日起，校勘整理，就与之紧密伴随；而且更准确地说，在雕版印刷大规模普及于经史书籍的五代和北宋前期，刊刻印刷书籍的目的，与提高复制效率以加快书籍流通相比，通过精细校勘来为读者提供文字准确、文本统一的读本，实际上要更为重要。史书是记录以往历史的载体，因而从这些史籍本身流转传承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校勘出版史籍的工作，可以说是在为古代的历史延续命脉。

由于历史典籍的复杂性，这种史籍校勘工作，不仅难以尽善尽美，每一种新的印本，往往还会不同程度地增添新的讹误。随着时代的延续，对古代史籍的整理校勘也就变得愈为迫切，需要勘正的问题亦随之日益复杂，而我们的生活却在不断远离昔日的历史。可想而知，整理校勘的难度必然不断增大。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史籍整理校勘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好在当代中国一直有一批既富有学养又勇于担当传承文化使命的学者，多年来持续努力从事着这一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近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评选推出的《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就向社会展示了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些著述。这个书目，包括了传统四部分类中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由于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我对史部书籍尤为关心，在这里想谈谈对这份书目中史部书籍的粗浅印象。

据云通过出版单位申报、社会读者推荐、业内专家实名推选等多种渠道，经过初审、通讯评审、会议论证、复核评审等多轮评选程序，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最终确定了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91 种。但这 91 种当中实际包括有很多汇刊的丛书，甚至诸如《续修四库全书》这样的大部头综合性丛书。因此，若以单种书籍统计，涉及古籍品

种范围之广，实际已经难以计数。

按照所公布书目的计数方法，在这 91 种书籍当中，属于史部的书籍总计在三十种以上，所占比例，大体合理。在这里面，既有像《二十四史》暨《清史稿》和《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这样统一编印的丛刊，也有许多像《战国策笺证》、《唐才子传校笺》、《旧五代史新辑合证》这样的单行印本，均衡兼顾各种形式。

数十年来，各出版单位印行的史部古籍，范围广泛，数量庞大，要想从中甄选寥寥三十几种书籍，是一件十分复杂、同时也相当困难的事情，短时间内很难尽如人意，其中有一些书籍，甚至还可能存在严重的不足。不过斟酌目前选出的书籍，可以看到，具体就每一种书而言，其入选此目的理由，大概并不相同，恐怕各有各的着眼点，若仅仅就其某一侧面而言，自然都有充分的合理性。读者阅读利用这些书籍时，应该能够有所别择，取其长而避其短。这是对待所有书籍的合理态度，当然也适用于这些校勘整理的古籍。

从总体上看，这份书目中的很多书籍，在几十年来整理校勘的史部书籍当中，都是十分难得的精品。例如，1956 年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后归中华书局不断重印的《资治通鉴》，不仅充分吸收了清代中期以来胡克家、张瑛、熊罗宿、章钰诸人的校勘成果，而且分段标点亦极为审慎。其具体点校工作集中了当时史学界十二位知名教授，包括顾颉刚、容肇祖、聂崇岐、王崇武、郑天挺、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何兹全先生等，分卷点校，然后再由顾颉刚、容肇祖、聂崇岐、王崇武四位先生组成“校阅小组”，在每一卷点完之后，重做两次“复阅”。不仅司职人员水平、层次之高，点校质量之佳，可谓“空前”，使这一印本成为此书现有诸本当中最好的本子，而且以如此强大的学术阵容来点校一部史书，勘定佳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也将是堪称“绝后”的事情。

入选这份书目的很多史部典籍，在整理校勘过程中，都能够广泛蒐集相关文献，罗列群书众本，辛勤比勘覈校，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值得充分肯定。但一项高质量的古籍校勘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善于裁断，有所发明，这一点也应该是相关主管部门，在做优秀成果评选时，着力予以关注的首要因素。在这次入选的史部书籍当中，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对《洛阳伽蓝记》的版本源流关系、正文与注文的析分准则等关键问题，都能够提出超越前人的明晰认识，再依此振裘挈领，考辨校释具体问题，要言不烦，新见迭出，堪称典范之作。

有些古籍，文字的准确性要求极为严格，往往一字千金，因而只适合影印出版，不宜重新排版印行，而单行影印的普通印本，最便利读者利用。如果说在大的类别方面，选书有什么不足或者说不够合理的话，我觉得这份书目对单行影印古籍的重视，普遍有所欠缺。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宋本《经典释文》，清代以来的学者都难得一见，对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都极为重要，而且其纸皮小本的形式，也非常便于普通学者备置查阅，有功于学术研究甚巨，理应入选此目，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史部书籍方面，除了从稀见史料的角度影印有个别文书资料以外，传世基本史籍，几乎见不到踪影。在已经影印出版的史部要籍当中，比如中华书局影印的清内府进呈本《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光绪原刻本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以及清末朱墨套印本杨守敬《水经注图》等，对学术研究，也都有重大价值，完全有资格列置此目。国家主管部门只有充分重视、鼓励这种单行影印的古籍，各个出版单位才能够影印更多应当影印的书籍。例如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是《史记》三家注中唯一存世的单行原本，对阅读、校勘《史记》，都有重要参考价值，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用传世较早的毛晋汲古阁刻本影印，学者通常只能利用《丛书集成》排印的本子或清末翻刻的版本，文字的准确性难以保证。不过，值得赞赏的是，在这份书目中，列有诸如《中国版刻图录》等一些版本图录，这也可以看作是影印古籍中一个特别的类别。《中国版刻图录》编制精湛，不仅为鉴别古书的版本提供了重要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印制，为研究古代版刻的历史发展，建立科学的版本学，以及系统研究中国印刷史，都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

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除了整理校勘成果之外，在这份书目的史部书籍当中，还有一小部分有关古籍的专题研究成果。在这当中，最值得称道的书籍，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此书以一人之力，对清代考据学鼎盛时期汇集一大批优秀学者心力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出深入细致的考订辨析，不仅对每一部典籍的具体考证结论，足以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传，而且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的核心宗旨方面，往往能够大大超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是二十世纪留给后人最为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很自豪地留给后人的“古籍”。

2012年8月24日记

【附记】

这篇文章，是应相关方面友人之邀而撰写的。近日在《光明日报》上刊出时，编者对原稿做了较大幅度的删削。在此特公布原稿，以存本来面目。

2013年11月16日